

厂肆志略

从《北平笺谱》说起

厂肆更谁来访笺，版杨名字迅翁传。海王村畔秋阳淡，
风景依稀似昔年。

这是我前两年回北京经过琉璃厂时偶然写下的一首绝句，是怀念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访求笺纸和郑西谛先生编印《北平笺谱》的事。“版杨”是“板儿杨”，板儿杨和张老西是两位刻制水印笺纸木板的高手艺人，因编印《北平笺谱》而将姓字流传下来，成为艺林佳话。

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给西谛先生的信中有一段写道：

板儿杨，张老西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借此已可知张□为山西人。大约刻工是不专属于某一纸店的，正如来札所测，不过即使专属，中国也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名（况且还有绰号）。

在这段话中，鲁迅先生是很有感慨的，觉得这样的高手工艺家，竟至连名字也不为人所知，仅以绰号著称。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其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技艺而出名，如过去北京“样

子雷”、“快手刘”等等，也就是因为他们画房样子、变戏法等高超技艺，得到了以上的绰号，真名反为所掩。就以琉璃厂而论，当时也还有“古钱刘”、“宋版刘”等人物。“板儿杨”所以出名，也是这种情况。至于张老西，那是因为张是山西人。过去北京称呼山西人，习惯叫“老西儿”，其中有玩笑的成分，也有亲热的成分，如再亲热点叫声“西哥”。但一般称呼“张老西儿”，也没有什么，只是叫久了，真名也为这一“官称”所掩了。

鲁迅先生编制《北平笺谱》的缘起，是与先生很早就爱好绘画、版画，爱好收集画集、笺纸分不开的。古诗说：“十样蛮笺出蜀州”，但是先生没有到过四川成都一带，成都很出名的“诗婢家”的水印诗笺也未见先生提起过。当时上海、杭州、广州的笺纸，先生都收集过，认为都不及北京的好，所以只印了一部北京的。

先生自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南下后，后来一共回过两次北京（当时叫北平），每次都到琉璃厂搜求了不少信笺。第一次回京，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记道：

……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菴阁搜罗信笺数十种，共泉七元。

同月二十八日记道：

……往松古斋及清闕阁买信笺五种，共泉四元。

第二次回京，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道：

鲁迅先生日记纪年时，一九一九年之前，纪年用干支，纪月、日用阳历；一九二〇年开始，不再用干支纪年。文中后面所引日记原文，均准此，但在干支之后，加注公历年代，用（）表示。

……往琉璃厂买信笺四盒。^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给西谛先生的信道：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②

信中随后就说到“自备佳纸”印制笺谱的事，这便是印制《北平笺谱》的准备和缘起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琉璃厂笺纸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后来在先生与西谛先生的努力下，《北平笺谱》便于一九三四年初出书了。第一次印了一百部，第二次又印了一百部。当时先生曾在给西谛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说道：“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到现在虽然只有四十多年，这笺谱便早已成为难得见到的文物了。而这十分珍贵的文物，便是搜求琉璃厂当时各家南纸店，如荣宝斋、清秘阁、淳青阁、松古斋等水印木刻笺纸印制的，在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佳话，在文化艺术典籍中留下了多少部精美的珍品，时至今日，虽非唐人写经，宋元佳槧，总也可以和明版、康版媲美了。

短短的东西琉璃厂街，由厂东门到厂西门，也不过二里之遥，其间书铺、南纸店、古玩铺、碑帖铺、裱画铺、图章铺、墨

① 先生日记中琉璃厂或写作“留黎厂”，本文所引日记原文，均写作琉璃厂，以资统一。

② 关于刻工的情况，清末《爱国报》所编《燕市积弊》中有一段介绍道：“刻字的手艺，本来甚苦，年岁或老或小的人全都吃不成。每刻一板，分两道手，有‘伐刀、挑刀’的分别。伐刀管刮板、上样、拉线等事，把字的正面伐好，交给挑刀去挑，挑刀把反面儿挑得，外带铲空（就是没字的空格）。乱先（指庚子前一编者注），每百宋字，才挣五百当十钱，顶好的手艺，才能了零碎儿，如名戳、票板、花信笺之类，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

盒铺栉比鳞次，在一二百年中，真不知留下了多少文人学士的足迹。虽说雪泥鸿爪，不计东西，但是有的人的足迹却深深印在文化艺术的史册上，千古不湮，这便如鲁迅先生和西谛先生奔走于琉璃厂，搜求笺纸，编印《北平笺谱》。如此不辞辛苦，热心文化，而这却是那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流所想不到也不能理解的，而这样的人却是直到现在也还不少。所以谈谈鲁迅先生与琉璃厂，谈谈那个时候琉璃厂的一鳞半爪，我想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琉璃厂气氛

乾隆时益都李南涧（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写道：“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鲁迅先生一生不喜欢看京戏，那时应酬也不多，平日公余除抄书之外，一遇暇日便到琉璃厂游览，很像李南涧所说的那种情况。

琉璃厂后来习惯说在和平门外，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因为和平门是一九二四年左右才开的，南北新华街也是同时才展宽的。在鲁迅先生去琉璃厂买书、访帖的大部分时间里，由城里去琉璃厂，还是不出宣武门，就得出前门，中间全有城墙挡着，是过不去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在宣武门里教育部上班，不论星期天或平日，去琉璃厂都是很方便的。走大路从菜市口经骡马市到虎坊桥，从梁家园斜穿过去，顺新华街往北不远就到厂桥，就是东西琉璃厂的中心了。如果走小路，从菜市口东边一点，进铁门穿小胡同到南柳巷，那就更没有什么路，便到了琉璃厂西门了。

琉璃厂以厂桥海王村公园为中心，往东是东琉璃厂，接一尺

大街、杨梅竹斜街；往西是西琉璃厂，接南北柳巷。过去东西两头都有铁门，俗名厂东门、厂西门。整条琉璃厂街上，由鲁迅先生时期，一直到后来，除去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一所三层的西式楼房而外，其他都是中式的铺面房，而且大多都是平房，间或有所两层的楼房，那也有如凤毛麟角了。不过这些铺房都很精致，一般都是水磨砖的砖木建筑，门面油漆得很整齐。开间大多都是二间、三间，五间的便是大店了。只有昔时宝名斋书铺是最突出的，九开间门面，当时人称：“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不过在鲁迅先生时期，宝名斋书铺早已关张，其他那些店铺，门面虽然不大，但后面进度一般都很深，而且都连着后面的院子，这样地方就很宽绰了。

琉璃厂各家店铺，大多都没有西式店铺的那种窗櫺；也不像江南店铺的那种排门板，白天去掉门板，店面敞开，无门无窗。琉璃厂店铺的门面，都有门有窗，窗上装玻璃，有的还是老式窗，下面玻璃，上面糊纸。店门后来大多改为西式拉门，过去则都是对开木门，白天开门营业，门上挂帘子，冬天蓝布镶黑云头夹板棉门帘，夏天夹板大竹帘，从街上走过，透过擦得十分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店内的一些风光：古玩铺的红木多宝榻上的花瓶、鼎彝；书铺书架上一叠叠的蓝布套夹着白色签条的古书；书画铺挂的各种字画、立轴、对联；墨盒铺架上的亮晶晶的各式各样的墨盒子、镇纸、笔架……。店名一般都是黑地金字的匾额，几开间门面的大店，在店名大匾的两旁，还对称地挂上两块小匾，如“藏珍”、“蕴玉”之类。柱子上都有红地黑字或黑地金字油漆得亮晶晶的抱柱对联。牌匾、对联都是当时名家书写的，翁同龢、朱益藩、宝熙、陆润庠等，应有尽有。这些对联都是嵌字格的，这里抄几副在下面，作为当日琉璃厂的一点资料吧。

宝气腾辉瞻典籍，

林花启秀灿文章。

宝林堂书铺

崇山峻岭琅嬛地，

文藪书田翰墨林。

崇文堂书铺

宝鼎芝房，嘉祥备至；

文场笔阵，典籍纷披。

宝文堂书画铺

万象峥嵘新眼界，

元龙品概古胸襟。

万元眼镜铺

这些对联，切铺名，切店铺内容，对仗一般都很工稳自然。尤其万元眼镜铺一副，用陈登的典故用得很好，很有点气概。

琉璃厂东西街，不管从东从西，慢慢走来，总是笼罩在一种文化、艺术的气氛中，这种气氛是琉璃厂所特有的，是从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直绵延到后来，其间将近二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

鲁迅先生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京，十二日就到琉璃厂游览，日记上记道：

星期休息。……下午与季蕓、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

其后，二十五日又去，二十六日、三十日又去。初到北京，风尘仆仆，除工作之外，朋友往来也很忙，却在不到一月之间，便去了四次琉璃厂，可见厂肆与先生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与当时所有学人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了。自此以后，十五年中，浏览古书，访求碑帖，收集信箋，时时徜徉于海王村畔、厂肆街前，那

去的次数就更多。

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最后一次回北京，在京住了十六天，又去了三次琉璃厂，二十七日记道：

... ..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往信远斋买蜜饯五种，共泉十一元五角。^①

先生这次往师大讲演，后来到信远斋买蜜饯及回家，是当时师大同学叫营业汽车接送的，这便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去琉璃厂。在东琉璃厂进口不远路南，那小小的两间门面的信远斋，嵌着玻璃的绿油漆的老式窗棂，红油漆的小拉门，前檐悬着一块黑漆金字匾额，写的是馆阁体的“信远斋”三个字。在初冬下午的阳光斜照中，鲁迅先生提着几包桃脯、杏脯之类的蜜饯，在店主萧掌柜拉门送客，“您慢点儿走……回见……”声中走出来，坐上车，回到城里西四宫门口家中。这普普通通的一点情景，谁能想到这就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告别自己多年来不知徜徉过多少趟的琉璃厂呢？真是“逝者如斯夫”，此情此景，应该早已和琉璃厂的气氛融合在一起了吧。

书肆杂谈

鲁迅先生早期到琉璃厂去是买书，间或也买点古钱等小古董。从日记中看，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甲寅

信远斋是以卖酸梅汤出名的。近人徐凌霄《旧都百话》中道：“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布檐横额，有的黄地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一九一四）几年中，先生经常来往的书铺是神州国光社、直隶书局、文明书局、宏道堂、立本堂、有正书局、保华堂等家，后来才到富晋书庄去。那时富晋书庄还在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内，等到迁至琉璃厂宏道堂旧址营业时，那已是一九二四年间的事，这在鲁迅先生离京之后了。先生早期买的书籍，最多是画册、丛书一类的书，如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神州国光社的《金冬心花果册》、《神州大观》、《功顺堂丛书》、《湖海楼丛书》等。当然这些都只是举个例子，先生每年买的书都很多，在一篇小文内书名是无法广为介绍的。

这些书铺中，有古书铺，有新书铺，如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便是当时以卖新印珂罗版碑帖、画册出名的店家；宏道堂、立本堂、保华堂则都是古书铺；直隶书局则是新书、旧书都卖的铺子，曾经影印过清代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近代人宋星五、周蔼如辑的《文渊楼丛书》。

琉璃厂的书铺，自从清代乾、嘉以来，绵绵二百载，其间兴衰代谢，不知变换了几百家。乾隆时益都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清末江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近人通学斋书铺主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是考证琉璃厂书铺掌故的名著。尤其是孙著《琉璃厂书肆三记》，时代晚近，更为详赅。鲁迅先生往来琉璃厂买书的一些书铺，在孙著《三记》中基本上都是著录了的。

琉璃厂过去书铺，以路南的为多，又以东琉璃厂为多。由厂东门过来，远及火神庙、海王村公园、小沙土园胡同中，每两三家门面，便有一两家书铺，家家都是牙签插架，满目琳琅。一些书铺，外面看看，只有一两间、两间阔，而内中进深却很深，有的是前后连接，即俗名“勾连搭”的鸳鸯房，看是三间，实际是六间，这样店内就很宽大了。铺中四周都是书架，有的前后房

隔开的隔断也是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线装书，书套一头都夹着一张白纸，写明书名、作者、时代、版式。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子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这种营业方式，其源流应该说是很早了吧。乾隆时朝鲜人柳得恭在他所著《燕台再游录》中有几句写琉璃厂书铺道：

……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富，广庭起簾棚，随景开阁。置椅三四张，床桌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时或往五柳居，与陶生活。因系大比之年，各省举人云集都门，多游厂中，与之言，往往有投合者。或群辈沓至，问答姓名乡县，扰扰而散……

这该是多么潇洒的书铺呢？这种风气一直流传到后来，常去书铺，坐坐也好，谈谈也好，在答问之中，都有不少学问。如果顾客是位专家，铺主也就在买卖之中，顺便讨教，增长知识。如果买的人学识较差，店主也会娓娓不倦地向你介绍。这一方面固然为了作生意，另一方面也使你增长不少知识。经常浏览琉璃厂书铺，那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了。

在琉璃厂书铺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本、目录专门家。晚近如正文斋主人谭笃生、会文斋主人何厚甫、文德堂主人韩逢源（绰号韩大头）、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文禄堂主人王搢青、个人营业的宝坻县人刘宇清（绰号宋版刘）、衡水县人萧金铭等人，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中尤以孙、王二人更为突出。伦哲如先生《辛

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所谓“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同王晋卿”便是指此。并自注云：“故都书肆虽多，识版本者无几人，非博览强记，未足语此。余所识通学斋孙耀卿、文禄堂王晋卿二人，庶几近之。孙著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王著有《文禄堂访书记》。皆共具通人之识，又非谭笃生、何厚甫辈所能及矣。”孙氏除上列二书外，还有《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著作。当然以上这些人都是琉璃厂的专门家，除此而外，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也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艺，才能胜任工作。

所说知识，就是熟悉各种书目，首先是四库的书目，其次还有南北各私家的书目，古代的、当代的，什么毛晋汲古阁、聊城海源阁、宁波天一阁等等。熟悉各种版本，什么宋版、元版、建刻、蜀刻、白口、黑口、家刻、坊刻等。要能作到像缪荃孙说的“宋槧元槧，见而即识，蜀版闽版，到眼不欺”，那就近于技矣。

所说技艺，就是整理古书，重新装订，重新换护页、书衣，配制书套，仿制抄本，仿制缺页，这中间工夫各有高低。一部破烂霉蛀的宋版书，到了高明师傅手里，重新拆开，轻轻地一张张地摊平，去掉霉迹，托上衬纸，补好蛀处，再一张张折拢，理齐，先用纸捻订好，压平，再配上旧纸护页，配上栗壳色或瓷青色旧纸的书衣，用珠子线（即粗丝线）订好，帖上旧纸题签，配上蓝布、牙签书套。就是用这样水磨的细工夫，一部破烂的旧籍便成为面目一新的善本了。高明师傅作起这些工作来，真有得心应手、起死回生之妙。晚近装褙师傅王仲华，技艺就非常高明，曾为傅增湘重装北宋本《乐府诗集》，傅在跋语中称他为“缀补旧籍，号为精良”，又说“修订讫事，精整明湛，焕然改观”。这像刻版工板儿杨、张老西一样，都是琉璃厂文化工艺中的高明之士。各书铺或藏书家都存有旧纸，平时把整理旧籍时多余的旧书

衣、护页等替换积攒起来，以作修配宋版元版等珍贵善本书之用。至于说重新装订一般的旧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鲁迅先生也常常委托书店重新装订旧书，如癸丑（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记道：

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豫付工价银二元。

十月五日记道：

往本立堂问所订书，大半成就。见《嵊县志》一部，附《郟录》，共十四册，以银二元买之，令换面叶重订。

十二月十九日记道：

下午琉璃厂本立堂书估来取去旧书八部，令其缮治也。

同月二十九日又记道：

晚琉璃厂本立堂旧书店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共一百本，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惟《急就篇》装订未善，令持归重理之。

从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琉璃厂书铺代客修缮装订旧书业务的一斑。

他们除代顾客修缮、装订而外，还接受顾客的委托，代为访求难得的书。如癸丑（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记道：

下午往琉璃厂搜《稽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先生所校《稽中散集》早已出版了，而起因却早在六十几年前，这也算是和琉璃厂本立堂书铺留下的一点墨缘吧。

琉璃厂在二百年间，不只是一个卖书、卖画、卖古董的文化商业区，也可以说像一所特殊的学校，其间不知培养、薰陶出多

少文物、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材。他们都是师徒相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孙殿起氏所编《贩书传薪记》，对近代书业师承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是很可珍贵的资料。

琉璃厂各书铺，在同光以前，大都是江南人，以江西人为多。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说：“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后来可能因太平天国的影响吧，南方人不来了，逐渐为河北省南宫、冀县、衡水一带的人所代替。说到他们的商业道德，虽然也有一些弄虚作假，如制造假宋版书、假抄本书，以残缺的书冒充完整的书出售等情况，但大部分来说，对待客人还是较为诚恳、朴实的。这也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鲁迅先生癸丑（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记道：

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
《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

书要卖高价，自己说明是想多赢几文，这自是老实的表现，所以得到先生的赞许。这比要了高价还说是“赔钱出售，忍痛牺牲”的生意经要实在得多。按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和《贩书传薪记》所载，这位诚实的掌柜是字叫信斋的程锁成，河北冀县人。

书价杂谈

鲁迅先生每年日记后面，都附有书帐。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

二六年，据书帐所载，共用了三千六百七十余元。这还不包括一九二二年的，那年的日记遗失了。如取前后两年的平均数计算，还要加一百四十元上去，那就是三千八百元左右，这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了。但是在所买的书里面，还没有什么善本书，即宋、元、明版，以及各种少见的禁书和稀有的抄本在内。

先生在壬子（一九一二）年日记书账后有小记道：

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

在这段后记里，既感北京当时书价之昂贵，又痛詈以书为骨董者之流购书而不读书，感慨是很深的。这里面便联系到一个书价问题。鲁迅先生在京十五年内，所用之书款，除极少数属于从外地或国外函购，或回南时在上海、绍兴购买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琉璃厂购买的，可以说，这点钱绝大部分都花在琉璃厂了。所用款项，一部分是买书，一部分是买拓片。如广义地说，碑帖拓片也是典籍，所以两样先生都记在书帐上。为此，琉璃厂书价的高低，与先生自是非常密切的了。

琉璃厂书价，在清代十九世纪中叶，还比较一般。这里先引一则李慈铭的日记作为具体说明。《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记道：

以钱二十五缗，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颐煊《读书丛录》二十四卷、歙县金辅之先生榜《礼器》三卷、江都焦礼堂先生循《群经宫室图》二卷、高邮王文简公《经传释词》十卷、栖霞祁兰皋先生配王婉侗安人《列女传补注》八卷、

《列仙传校正本》二卷，及马令《南唐书》二卷……

共书七种，五十卷。二十五缙制钱，折合后来铜元二千五百枚，合五六块银元。看来这些书一般都还是乾、嘉刻本，其价钱较之后来，固然不能说是十分便宜的，但也不能说是十分贵了。

琉璃厂书价日渐腾贵，是在清代末年。据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张之洞《书目答问》出来之后，掀起一股买书风，京都士人都到琉璃厂按图索骥，书铺生意兴隆，书价也就日渐上涨了。那时宋版书，计叶论值，视版式好坏，每叶三五钱，殿版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版，每册五六钱，新印的书，看版式、纸张的精粗，区别论价。一般真字版比宋字版贵十分之二三，连泗纸比竹纸贵十分之二三，道路远的又比近的贵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钱和两，都是指纹银。宋版书每页就以三钱算，五十页一册，四册一套的书，就要卖六十两纹银了。当时江南的米价，一石还在一二两纹银之间，四册宋版书，就是四五十石米的价格了。

乾嘉时黄丕烈《书舶庸谭》中《宋刻 王右丞文集 跋》云：

王右丞文集，即所谓《山中一半雨本》，许丁卯集（元刻）即所谓《校宋版多诗几大半本》，……惜以物主居奇，必与《说文》并售，索值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说文》已置一部，不复重出，作书复之，许以二十六金，得此两书，书札往返再三，竟能如愿。

那时二十六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书，到了清末以叶计值的时候，恐怕再加两三倍也买不到。但是到了后来，就是鲁迅先生在琉璃厂买书的年代里，那就更不得了了。蜀人傅增湘氏戊午（一九一八年）买北宋本《乐府诗集》一百卷、二十四册，以银元一千四百元成交。替王叔鲁（即后来的大汉奸王克敏）买宋版《后汉书》残本四十九卷，以银元一千五百元成交。俟后王书散出在琉璃厂，《后汉书》

又被傅氏以一千二百元收进。武进陶兰泉买明钞本《墨庄漫录》，以六百元成交。这些都是琉璃厂的豪客，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视古籍为骨董者”了。按傅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收藏有宋、元版《通鉴》各一部，自题为“双鉴楼”。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所说的“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便是指他。傅买书时鉴别古籍，议论书价，十分精明。以成千的银元买一套书，那是因为当时的书价就这么贵，并非是他买得吃亏。他买书一般都是买得十分合算的，如前所说一千五百元的书，他以一千二百元收进，便是一例。

以上谈的是那时宋、元版善本书的价钱。至于其他的书，在琉璃厂要看各种情况，时贵时贱，价钱并不稳定，基本上是根据顾客的购买情况而涨落。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有几句说：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

鲁迅先生此文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写的，但内容谈到五四以后及民元书价，所以也适用说明琉璃厂书价涨落的情况。再如伦哲如在所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中也说：“……同是一书，适时则贵，过时则贱，而时之为义又至暂，例如辛酉（一九二一年）以前，宋元集部，人所争得也，乃过此则无问之者矣。又如辛未（一九三〇年）以前，明清禁书，人所争得者也，乃过此亦几无问之者矣。”

这位伦先生也是跑了一辈子琉璃厂的人，所说都是琉璃厂实情，就是琉璃厂书价，常常是因为大家都抢购某一类书，这类书的

价钱便一哄而高了。反之，无人过问的书，便十分不值钱。据说在清末时，普通地方志没有人买，只有日本人买，书铺以“罗”论价，一元一“罗”。所谓一“罗”，就是把书堆起来有一手杖高。即使是少见的善本志书，因为无人过问，价钱也很便宜。等到一九三〇年前后，北平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注意购买方志，各私人藏书家也跟着抢购，不久方志一门，便身价百倍了。鲁迅先生在癸丑（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从琉璃厂立本堂买《嵯县志》、附《郊录》十四册，价二元，那自是十分便宜的了。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还说过《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清代官书无人过问，价钱低廉的情况。在当时，除此之外，也还有《皇清经解》等类的书，也是无人过问，都同称斤卖差不多，也常常是以手杖论值卖给日本人了。而相对作为骨董的书却更价值惊人了。自从庚子之后，《永乐大典》散出，清末琉璃厂文友堂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代价到处搜求，卖给日本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曾记：山阴人吴莲溪，庚子乱中翰林院私分《永乐大典》时，曾分得百来本，当时尚无卖处。宣统间，由于琉璃厂书铺重价收求，吴因之致富。去世后，家中尚有二本，一全一不全，全的要卖三千元，不全的要卖二千元，那就更是奇货可居了。算来鲁迅先生十五年中，全部在琉璃厂买书的钱，也不够买这两本《永乐大典》的。

琉璃厂是古籍集中的地方，书价与外地比较，一般要比外地高。利之所趋，琉璃厂书商都以到外地收集古籍为谋利捷径。近的到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远的到云、贵、川、广，每趟外出收书，都有不同的收获。有名的如述古堂于魁祥一九一七年在山东买到宋本《八经》、宋本《唐十家小集》。个人营业的衡水人彭文麟，专门外出收书，远到湖南、江西，一九三一年在山西曾廉价买到《永乐大

典》十余册。山西南路过去不少经营钱庄票号的商家，收藏的明清小说很多，明清小说书价大涨之后，琉璃厂书铺便常前去收购。文介堂张德修在山西购到《金瓶梅词话》，回到北京，以八百元卖给北京图书馆，真可算是一本万利了。

鲁迅先生一九一三年回绍兴时，在绍兴奎元堂买到过一部毛晋汲古阁的《六十种曲》，二十四元。后来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经济困难时期，把这套书在北京以四十元的代价卖掉了。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记云：

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

在这一买一卖之间，也可以看出当时北京与外地书价的差异了。

当然，上面拉杂所写，还是那时琉璃厂书价的大行大市。至于说在小市冷摊上买到便宜货，那也是时而有之的事。但那多是因为卖者是外行，买者偶然碰巧，不能作为书价的行情。

碑帖铺和古钱铺

鲁迅先生在北京，有几年勤于抄碑、校勘碑，便经常买拓片，因此和琉璃厂碑帖铺的关系很深、很多。读先生日记，记录的碑帖铺的店名就有敦古谊、师古斋、式古斋、富华阁、肆古斋、宜古斋、仪古斋、耀文堂、震古斋、访古斋、德古斋等十几家之多。碑帖铺在琉璃厂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固然书铺如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文明书局等也影印碑帖发卖，有些古玩铺偶尔也卖旧碑帖，但这都和碑帖铺不同。碑帖铺则是不卖别的，专门卖碑帖的。其内容大约一是已裱好的碑帖，作折叠册页式，有木制夹版，或锦裱封面，有各